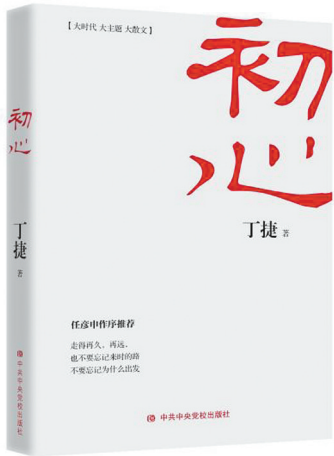


本期聚焦

弘扬新中国的奋斗精神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荐一批新书

本报记者 郑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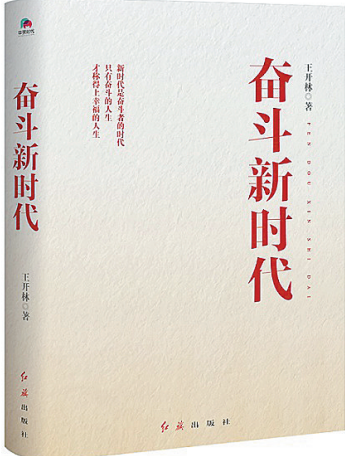


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各大出版社推出一批弘扬奋斗精神的精品图书,以生动细腻的笔触,独到的见解,介绍了新时代奋斗者的光辉足迹,激荡着时代的强音。现选介如下,以飨读者。

《初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是著名作家丁捷一部政论散文集。初心,这是当今社会的大主题,是人生的大文章。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主题;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有初心,践行初心便能凯歌行进,偏离初心难免误入歧途。该书以生动细腻的文字笔触,梳理个人、政党和国家的初心,讲述初心的建立、践行、摇摆、丧失和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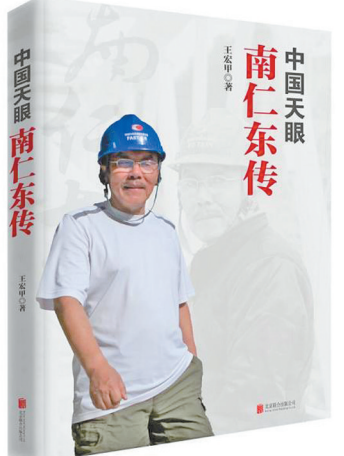
《奋斗新时代》(红旗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是著名作家王开林新著,该书分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自胜者强,自强者胜”“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四大章节,共含60余篇文章。作品谈人生,谈世事,谈见闻,谈梦想,谈读书,谈勇气,虽然每篇文章看上去各自独立,但内涵或说特质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表达了人生须乐观进取的观念。作品持一种洞明达观的态度,一直或明或暗地告诉读者,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伟大的马克思》
《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陈先达著。全书以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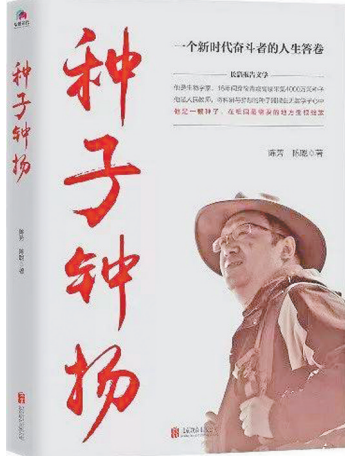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翔实生动,细节充沛地将南仁东的功业与贡献,放在整个人类天文历史上考察,视野开阔、纵横捭阖、大开大合,呈现了报国、敬业的南仁东的感人事迹,是一部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长篇报告文学。书中收入了10余幅珍贵照片,图文并茂。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面面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顾保国著。该书紧紧围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展开论述,深刻剖析了党员干部群众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其存在的危害、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处理对策。该书语言通俗易懂、案例典型、剖析深刻,附有漫画图片,把政治性、时代性统一起来、严肃性与生动性结合起来,该书既可以作为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点读物,也可以作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警示教育的指导用书,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的参考用书。

《忠诚 干净 担当: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
《忠诚 干净 担当: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李子敏著。作者是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共产党员,长期在兵工企业、国防工办等担任领导工作。2006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紀念章。书中,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读到了作者入党的初心和不负使命的忠诚:作者两次入党,矢



志不渝;一生忠诚报党,干净做人做事,每每临危受命,不畏难思退,以党的事业为己任之大任,努力工作。细腻的描写中包含着作者对党、人生、生活的浓浓的热爱,生动的情节中宣扬了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干净、担当。

《种子钟扬》
《种子钟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9月出版),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三八红旗手”陈芳与新华社战地记者陈聪所著。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时代楷模钟扬的奋斗人生。作者以优美感人的文笔,生动翔实的细节记述了钟扬的动人事例,解密“时代楷模”钟扬的“种子”基因、追寻他16年如一日援藏的艰辛岁月、探索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精神内涵,带领读者走进一位新时代奋斗者短暂而又闪亮的人生。

民族文化探荟

再说昆明与“昆明族”

宋炳龙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菴、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这里是说:西边从今天的保山(桐师)以东到北边洱海边上的喜洲(叶榆)。“菴”是菴唐县的简称,菴唐县就是今天的云龙县的旧州;“昆明”就是“昆明国”,这个“昆明”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越菴、昆明国……”的昆明。证据是《史记·集解》徐广说:“永昌有菴唐县。”说明是菴唐县是在永昌郡。索引崔浩云:“二国名”;菴与昆明是两个国家的名字。

《史记·正义》“菴音菴。今菴州也。昆明,菴州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正义》说:“菴”与“昆明”都是地名。菴州县与南方的昆明接壤,是地名。以上说的、按文理“菴”是指菴唐县,今云龙县旧州;“昆明”是指滇池边的昆明,所说的是一片土地上的旧州到昆明。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民族迁徙,随着畜牧迁徙,不常在一起居住,没有君长,在数千里的土地上任意迁徙放牧。要不然从保山(桐师)以东到大理的喜洲(叶榆)不过二百来公里,哪有数千里地。而且大理喜洲(叶榆)

是在云龙县旧州(菴唐县)的东北方,不是在正东方。在司马迁时期,昆明的出现只有昆明国,没有其它的地名叫做“昆明”。

另外在西汉时期还有更大的郡——越菴郡,即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它在叶榆的东北方,这里的“北至叶榆”,如果我们加一个“东”字,成为“北至叶榆东”更为合乎逻辑。那么这里的“菴”应该指的四川西昌(越菴郡)到“昆明”,才合乎“南接昆明之地”。太史公在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没对这一带的地理不够熟悉,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准确的地图,产生误差是难免的。

为什么有人把昆明这个地名定为“昆明族”呢?有的人把“名为菴,昆明。”误认为是从西边的保山[同(桐)师]的东方,到北方叶榆之间的民族,便产生了“昆明族”。汉武帝听了张骞从西域回来的报告,信以为真,便命令张骞从蜀国、犍为出发;并且四路一起出发。《史记·大宛列传》:“……南方闭菴、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音浙)杀略汉使,终莫得通。”这段话的意思是:南方被阻挡在越菴郡(今天四川西昌)与昆明

(今天的昆明市)。昆明地方的人没有部落首领,善于做草寇和强盗,动不动就抢劫和杀汉朝的使臣,所以没有通过。所以有史学家把这里的“菴”与“昆明”误定成“昆明族”。

《史记·大宛列传》:“……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于是……遣两将军,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颜师古注:“……汉使求身毒国,而昆明所闭。”汉朝的使臣为了寻求印度(身毒国)的道路,到了昆明被阻挡住了。《华阳国志》说:哀牢王国之所以“生民以来,未通中国”,就是因为“南中昆明阻之”。哀牢王历史以来未能与中原皇帝相通,主要是昆明地方阻隔著,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地名,不是族名。

唐代的“乌蛮”“白蛮”有着族属上的渊源关系。马曜先生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里说“……见于汉代的晋记载的滇獠、叟、爨,不过是居住在同一地区内的居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而已。”有史以来,叟与爨(白蛮)就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他们是一个民族的两个支系。

“叟”就是“乌蛮”,“爨”就“昆明人”,“昆明人”即是白蛮。

在先秦时期,“爨人”分布的区域很广。从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北岷江流域与羌族杂居的芦山县、雅安,向南跨过金沙江至贵州北盘江、云南建水、石屏峨山;西至今天的楚雄州永仁、大姚、姚安一带,东至今天四川宜宾一带,这些区域内的“爨人”就是所谓的“昆明人”。秦朝的“爨侯国”就在今宜宾市。战国末年,秦国的商人便通过蜀郡(四川)而“南御滇獠,爨蛮”。说明滇池周围居住的爨人。爨蛮县西南今天云南东北部昭通地区的平坝中,住有不少爨人。按这个史据里的说法:“而爨人(白蛮)则主要分布在平坝地区,山区为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分布区域,有爨人(白蛮)的分布区域往超出滇国的统治区域范围以外。事实说明,在秦到东汉,昆明地区爨人(白蛮)居多,提到爨人(白蛮)就叫“昆明人”,昆明成了爨人(白蛮)的代称。所谓的“昆明族”就是白蛮。

如果我们不把“爨人”定位为“昆明人”,那么,居住在云、贵、川三省这片土地上的爨人哪里去了呢?我的回答是:有的专家把“爨

人”(白蛮)以地名代称的昆明人,弄成了“昆明族”了。这是云南民族史上的一大误区,也正是这一误区,造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族源混乱,所谓的“昆明人”就是白蛮为主的民族。像在三国之时,把云南人叫做“南蛮”,“南蛮”是云南人的代称(也是统称),南蛮并非是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昆明人”也不是单指“白蛮”,而是指以“白蛮”为主的居住在昆明地区的族群。

所谓“昆明人”居住的区域,就是爨人(白蛮)与叟人居住的区域,也因为爨人(白蛮)在昆明周围居住的人口较多,所以叫成了“昆明人”。难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川人,就是“四川族”,云南人就是“云南族”,贵州人就是“贵州族”,昆明人就是“昆明族”,大理人就是“大理族”吗?很明显的爨人(白蛮)就是白蛮,我们不能把白蛮误认为“昆明族”,更不是“乌蛮”。乌蛮与白蛮从汉朝到唐初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爨”的集居地在滇国统治中心的滇池地带较多,所以用地名代称“昆明人”的“爨人”就是白蛮。纵观以上的历史记载,昆明一词从汉朝至今都是以地名出现,这应是毫无疑问的。

吃“两栖鱼”他想到的是《诗经·陈风》:“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他考证《本草纲目》:“魴鱼处处有之。”以为魴和鲤是中国很普遍的食材,是古人的家常菜,而鲤鱼以黄河所产最佳。“炰魴鱼”缘起《梦溪笔谈》:“生炒魴鱼丝”源头在《山海经·北山经》中,更被《颜氏家训·归心》所载:“水晶虾饼”之材料最早可考《尔雅翼》:“煎魴饍”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就说得清清楚楚:吃莲子他想到《古乐府·子夜夏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吃鲍鱼先生想到《史记·秦始皇本纪》:“会暑,上辍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说到笋,先生更是引经据典,说尽了食笋的好处。中国人好吃笋,《诗经·大雅·韩奕》说:“其簋维何,维笋维蒲。”《唐书百官志》也说:“司竹监掌植竹苇,岁以笋供尚食。”古代有专门管理种笋的官员。笋在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苏东坡初到黄州即写诗称道竹笋“好竹连山笋笋香”,提倡“餐餐笋煮肉”。在《笋》这篇散文中,梁先生还提到杜甫的《发秦州》,其“密竹负冬笋”句,引出“冬笋不生在地面,冬笋是藏在土里”的话题,指出冬笋这种食材的稀少难得。

先生对吃是有深悟的。他说:“然而讲究起吃来,这其中更有艺术,又有科学,要天才,还要经验,尽毕生之力恐怕未必能穷其奥妙。”中国人最讲究吃,“是世界第一”,吃得精其实还不算本事,酸甜苦辣五味调和才算真正的“食客”。中国人的吃相在古代其实很文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因此有了独特的“餐桌礼仪”。但先生不主张吃饭过于重视礼节,“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不妨稍为放肆一点。吃饭便能充分享受,没有什么太多礼法的约束,细嚼慢慢咽,或风卷残云,均无不可,吃的时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后抹抹嘴擦擦面,像这样的乐事并不常见。”这些文字透出温暖,暴露出作者随和可爱的性格。

梁实秋在《饮酒》一文中说:“酒实在是一种妙品,一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文中说到酒的发明历史,包括酒的礼仪,提倡“花看半开,酒微微醺”,这其实也是先生对整套饮食文化的见解,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吃完每一餐,总有文字公诸于世,吃的智慧与哲理,流淌在这些趣味盎然的文字中。

书人书事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张雪飞

也许是热爱文学的缘故,也许是在业余创作之路上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的缘故,我在平时的阅读过程中,对描写作家写作之途的书稿,文章格外关注(尤其关注作家成名之前的际遇)。读得多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诸多作家的成长道路上,退稿,似乎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余华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作家。余华还在做牙医时,就开始了写作,但投出去的稿件大都退回来。据说由于退稿太多,邮递员到后来都懒得敲门,往往是把装着退稿的大牛皮纸信封从院子外边扔进来。余华的父亲只要听到很响的声音,就知道退稿又来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里,评出了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中国作家麦家的《解密》名列其中。这部现在享誉世界的20多万字的麦家首部长篇小说,其问世之路也充满坎坷。麦家花了11年时间把它创作出来后,先后遭到17次退稿,经历了20多次的修改,“报废”的文字据说有上百万字。

作家刘庆邦曾在演讲中讲过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写作故事。沈

从文连小学都没毕业就到北京谋生,想靠写作维持生存。有时候作品难以发表,他连吃饭都成问题。他会到报馆去看作品发表了没有,如果发表了,就顺便要稿费解决生计问题。当时一家报社副刊的主编看不上他的稿子,当着他的面将他的稿子用浆糊粘起来,指责说:你这东西还想发表,只能当废纸!并当场把他的稿子攥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去了。面对退稿的无情打击,甚至是像沈从文这种当面遭遇羞辱,作家怎么办?正所谓“非常之必待非常之人。”在奋进者的人生信条里,是没有逃避畏缩之说的。那些最终在写作上大获成功的作家,是不会向困难低头的——稿件被退回来,就接着再投、再写呗。余华就曾回忆说:“被一个杂志退稿了,我就换家杂志再投稿。因此,一件作品寄给过很多杂志,可以说我的稿子去过的地方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

有的作家甚至更激进,直接把退稿单贴到墙上,以鞭策、激励自己。美国当代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写出第一个原创故事《欢乐礼券》就遭到了退稿,他并未气馁,将退稿条钉在墙上。后来他一直坚持这样做,当钉子难以承受退稿信的重量时,他就换个大钉子,

继续钉、继续写。

中国作家中像这样做的也不乏其人。贾平凹未成名前,也曾遭遇大量退稿。他创作相当勤奋,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又源源不断地被退回来。他曾感慨:“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他将收到的这些退稿信都贴到墙上,“抬头低眉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

细细探究,作家遭遇退稿,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稿件质量有问题,还达不到发表、出版的水平。二是稿子好但不适合发表、出版。这看似难以理解,但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阎连科曾戏称:“我是中国作家里被退稿最多的人。”小说《四书》创作出来后,他觉得小说的结构、语言、人物塑造都发挥了其最大才华,但先后投给二十多家出版社、杂志社,得到的反馈都是这是一部好小说,但确实不适合发表、出版。三是编辑的眼光有问题,没判断出作品的价值。四是作家尚没名气,不受编辑待见。这大概是作家遭遇退稿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我看过不少作家的自述,他们被退稿都发生在成名前,成名后就很少甚

读书漫笔

美食家梁实秋

李成生

梁实秋写吃的文字,令人垂涎欲滴中领悟生活的智慧,甚至感悟人生的意义,他是把吃写到化境散文大师。他说:“人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了。”(《雅舍谈吃》,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下同)我坚信梁先生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他那些“吃的经验”如若不是亲身体味,是写不出来的,而且,他不但善吃,还能烹饪美食。

梁先生是个“吃贯中西”的人,他吃过中国传统名菜火腿、醋熘鱼、锅烧鸡、狮子头,还吃过美国的热狗,喝过康乃馨牛奶;他在北平(今北京)的小巷里喝豆汁吃油条,在美国排队吃自助餐,他应该是一位最理解吃也最会吃的先生。

梁先生吃过的一些菜,于我而言闻所未闻,如《糟蒸鸭肝》:“所谓糟蒸鸭肝,精选上好鸭肝,大小合度,剔洗干净,以酒糟煮熟。妙在汤不浑濯而味浓,而且色泽鲜美。”《爆双脆》:“所谓双脆,是鸭胗和牛肚儿”,特点是“吃在嘴里初中带脆”。一册《雅舍谈吃》里,直接以菜名人题即达63篇,不但介绍菜的用料和烹饪方法,还纠正一些误解:“西施舌属于贝类,似蛭而小,似蛤而长,并不是蚌。”缘起都达夫的《闽小记》说,西施舌“指蚌而言”。“《闽小记》说,西施舌“指蚌而言”,一些烹饪大师也望其项背。

梁先生对做菜研究很深。他说:“醋熘鱼当然是汁里加醋,但不宜加多,可以加少许酱油,也不能多加。”狮子头的秘诀是“多切少斩”;瓦块鱼的真相是:“一块块炸黄的鱼,微微弯卷作瓦片形,故以为名。”“锅烧鸡用小嫩鸡,北平俗称‘桶子鸡’,疑为‘童子鸡’之讹。”芙蓉鸡片的烹调秘方是:“取鸡脯肉,细切细斩,使成泥。然后以蛋白搅和之,搅到融和成为一体,略无渣滓,入温油锅中摊成一片片状。片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梁先生有多种方法吃鲍鱼:红烧、凉拌、烩羹,只求“异香满室”。

先生写吃,亦然形成一部“梁氏菜谱”,据说不少主妇就是看着他的小品文做饭的。但梁先生其实不仅仅是写吃,他骨子透出的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即使是非常短小的篇什,都透出一股浓浓的“文化味”。他不承认自己对饮食文化有研究,只是认为“只因我连续吃了八十多年,没间断。”可是连续吃了八十多年的入比比皆是,写出如此奇妙文字者风毛麟角。关于吃的文化,先生引出《朱子语录》:“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他其实怀着一颗平常心写吃:“我以为要求美味固是人心,然而何曾有背于天理?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要求在,上天生人,在舌头上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味蕾?”他写吃的目的是:“偶因怀乡,谈美味以寄兴;聊为快意,过屠门而大嚼。”

吃“两栖鱼”他想到的是《诗经·陈风》:“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他考证《本草纲目》:“魴鱼处处有之。”以为魴和鲤是中国很普遍的食材,是古人的家常菜,而鲤鱼以黄河所产最佳。“炰魴鱼”缘起《梦溪笔谈》:“生炒魴鱼丝”源头在《山海经·北山经》中,更被《颜氏家训·归心》所载:“水晶虾饼”之材料最早可考《尔雅翼》:“煎魴饍”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就说得清清楚楚:吃莲子他想到《古乐府·子夜夏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吃鲍鱼先生想到《史记·秦始皇本纪》:“会暑,上辍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说到笋,先生更是引经据典,说尽了食笋的好处。中国人好吃笋,《诗经·大雅·韩奕》说:“其簋维何,维笋维蒲。”《唐书百官志》也说:“司竹监掌植竹苇,岁以笋供尚食。”古代有专门管理种笋的官员。笋在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苏东坡初到黄州即写诗称道竹笋“好竹连山笋笋香”,提倡“餐餐笋煮肉”。在《笋》这篇散文中,梁先生还提到杜甫的《发秦州》,其“密竹负冬笋”句,引出“冬笋不生在地面,冬笋是藏在土里”的话题,指出冬笋这种食材的稀少难得。

先生对吃是有深悟的。他说:“然而讲究起吃来,这其中更有艺术,又有科学,要天才,还要经验,尽毕生之力恐怕未必能穷其奥妙。”中国人最讲究吃,“是世界第一”,吃得精其实还不算本事,酸甜苦辣五味调和才算真正的“食客”。中国人的吃相在古代其实很文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因此有了独特的“餐桌礼仪”。但先生不主张吃饭过于重视礼节,“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不妨稍为放肆一点。吃饭便能充分享受,没有什么太多礼法的约束,细嚼慢慢咽,或风卷残云,均无不可,吃的时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后抹抹嘴擦擦面,像这样的乐事并不常见。”这些文字透出温暖,暴露出作者随和可爱的性格。

梁实秋在《饮酒》一文中说:“酒实在是一种妙品,一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文中说到酒的发明历史,包括酒的礼仪,提倡“花看半开,酒微微醺”,这其实也是先生对整套饮食文化的见解,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吃完每一餐,总有文字公诸于世,吃的智慧与哲理,流淌在这些趣味盎然的文字中。